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

张天社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长期以来未搞清楚,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新史料进行实证,认为西安事变期间周与蒋曾两度会面,第1次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第二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前次会面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但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二次会面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周恩来 张学良 蒋介石 宋子文 会面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会面,无疑是西安事变和国共两党的重大事件,但是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未搞清楚。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西安事变新史料,进行实证辨析,以期澄清这一问题。

一 周蒋会面时间和次数的不同说法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和次数,从西安事变发生时起就存在不同的记述和说法,以致后来的学者莫衷一是。总结起来有以下3种:

(一)一次说

一次说大量存在于大陆的回忆材料和研究论著中,但对其具体时间尚有分歧。大陆的回忆材料都说周蒋会面是1936年12月24日晚上的事,并就这么一次。

上世纪70年代末,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说:“当天(24日)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①申伯纯此书影响很大,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采取此说,无所怀疑。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就认为:“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②

到上世纪80年代,《周恩来选集》公布了关于西安事变的3封电报,其中在12月25日晚上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周恩来汇报了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结果,介绍了他与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其中说:“蒋已病,我见蒋”等语。^③但是电报中没有说明他见蒋的具体时间,有人据此推断这是25日当天的事。上世纪90年代,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认为:“25日谈判后,蒋介石第一次接见了

① 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②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周恩来。”^①然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和张魁堂所著《张学良传》李义彬所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等书仍坚持认为:“(12月24日)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②不管24日晚上或者25日上午,大陆学者认为只有这么一次。

(二)两次说

两次说多见于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和台湾的论著中,但对其具体时间也存在分歧。西安事变结束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傅斯年认为周蒋在西安有两次会面。1937年1月4日,傅斯年在致蒋梦麟、胡适等人的信中说:“周恩来晤蒋两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 confirmation[证实])。”^③1月7日,傅斯年再致函蒋、胡称:“genera lissim o[委员长]在秦,晤周恩来两次。第一次不发一言,听周演讲。第二次谈得很高兴。”^④傅斯年当时为中央大学校长,与南京上层关系密切,况且当时事变刚结束不久,所以他的记载可信程度较高,但他却没有提及周蒋两次会面的时间。

台湾学者王廷禹在《细说西安事变》中,根据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记载周恩来与她曾两次会谈等内容,推断这两次谈话“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⑤并认为其时间在23日、24日。而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虽也认为周蒋两度会面,但又认为其时间在24日和25日。“24日这天……中共中央的新指示到了西安,周恩来就根据这新指示当夜10时去看了蒋和蒋夫人”。“圣诞节的早晨,周恩来第二次往见了蒋和蒋夫人”。^⑥

(三)三次说

由于前两种说法在具体时间上存在分歧,于是就衍生出第三种说法,即23日、24日、25日周蒋三次会面的猜测。近年来,张俊义在解读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时,就提到:“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中……记载,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共会面三次……究竟情形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⑦

由于时代的局限,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周蒋会面问题都避而不谈,隐讳莫深。蒋介石在其《西安半月记》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均对此事只字不提。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不点名地记载了她与周恩来的两次会谈,同时强调周恩来“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⑧可见蒋、宋、张都有意回避此事,使得周蒋会面问题难以明朗和清晰。

二 周蒋会面时间和次数的考证

在西安事变中,周蒋究竟几次会面,这是国共两党在十年对立后的重大事件,也是两党走向合作抗日的重要事件,所以我们尚需借助近年公布的新史料仔细考证。

其实,不论是一次、两次,或者三次会面说,不外乎就是12月23日、24日、25日三天的不同组合。如果弄清了这三天的基本情况,周蒋会谈的时间和次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① 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66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李义彬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5页。

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8页。

⑤ 王廷禹著:《细说西安事变》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8页。

⑥ 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282页。

⑦ 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秘辛》,《百年潮》2004年第7期。

⑧ 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版,第420页。

(一) 12月23日周蒋会面一说并不存在

2004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了他们珍藏的宋子文档案,其中包括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同年《百年潮》第7期上公布了张俊义的译稿。根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周恩来曾两次面蒋,一次是12月23日深夜,另外一次是12月25日。宋子文日记在23日记载:“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短寒暄了几句。”25日记载:“我与蒋夫人见了周,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周见了委员长。”^①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公布对12月23日、25日周恩来两度见蒋的观点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但是,我们认为23日周蒋是不可能见面的。12月23日是宋美龄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她在回忆录中明确记载蒋介石“不愿见”周恩来。周恩来到西安后,每天都有几封电报给陕北中央,如果23日周恩来已与蒋见面,他不可能直到25日释蒋时才将此事报告中央。这时双方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中共中央的释蒋指示也没有到来,周见蒋的时机并不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7月,西安事变时的中共代表之一博古在汉口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他向斯诺谈到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斯诺记载说:“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当夜10点钟后周第一次去见了蒋。在此之前,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主要是经蒋夫人、端纳和张学良的力劝他才同周见面……在他们初次会见之后,周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蒋,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斯诺进一步记载说:“周在之前也许可以去见蒋,但一直在等博古从保安把红军的条件带回来。”^②博古的谈话证明西安事变期间周蒋曾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在12月24日晚上10点以后,而不是23日;第二次是在25日圣诞节的上午。

博古与周恩来同为西安事变时的中共代表,他们虽有分工,但是互通消息协商行事的,博古肯定熟知周恩来的行踪和活动;况且当时处于国共二次合作的初期,博古的言谈也较为谨慎,所以他的谈话无疑是可信。

博古明确表示,“在此之前(24日),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所以23日周蒋会面的说法只是臆想。那么,新近公布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关于周蒋23日会面的记载也有错误吗?是的,宋氏日记原为英文打印稿,为事后追记,并非当时日记,所以记忆错误是难免的。

2007年,周天度在《百年潮》第10期上公布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这是由存放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原件抄录整理而成的,所以十分珍贵,比起早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更为客观真实,揭开了以前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在12月23日的记载中,并未回避周恩来已参加谈判及提出见蒋等情况。其中说:“清晨未起……为妻私语曰: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该党代表周恩来前托张(学良)要求见余,余坚拒。而现今子文已来此,不如属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后子文即约彼相见……但彼只要求余与之一见,虽不谈话亦可。余……明告子文……可答以蒋先生近日精神不佳,似不便见。约定明日十时来见余妻也。”^③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明确证实23日周蒋之间并未谋面,同时也证明周恩来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2月24日,所以宋子文日记中记载的23日周蒋会面之事并不存在。

(二) 12月24日周蒋第一次相见,但未多言

12月24日周蒋见面一说是大陆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写到:“当

①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② 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③ 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天(24日)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请周坐。蒋……向周表示以下三点: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3.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谈完以上三点,蒋坐在床上表现疲劳困顿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于是向蒋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连说:“好,好。”周就此辞出。”^①申伯纯并非当事人,但他也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晚见面谈话的情形。

对24日的周蒋会面一事,博古的回忆亦可为之佐证,博古对斯诺说:“当(24日)夜10点钟后周第一次去见了蒋。”

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日记》。蒋氏在24日记载:“(张学良告诉蒋介石说)共党……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②

由此可见,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的周蒋第一次会面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但24日会面时周蒋之间是否存在像申伯纯记述的那么多语言和蒋介石的三点承诺,还值得研究。从蒋氏日记看来,周蒋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交谈。实际上,因当时天色已晚,蒋介石已睡,周恩来不便多言。在蒋介石说明可与张学良接洽后,周即退出,周蒋并没有做深入的交谈。

24日周蒋第一次相见并未多言的事实还可以从张学良晚年的谈话中得到证实。1990年8月,日本记者在台北采访张学良。当记者问道:“12月24日午后10时后……蒋介石和周恩来实现了历史性会谈……先生当时在场吗?”张学良明确回答:“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当记者再问到谈话内容时,张学良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③可见,张学良晚年不但肯定了12月24日晚上的这次会见,而且证实当晚并没有谈什么。

(三)12月25日周蒋第二次会面,蒋介石作出重要表示

1936年12月25日晚上,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④这是我们在当时唯一能够证明周蒋相见并进行交谈的原始资料,也证明申伯纯记述的三点并非虚言。但因为周恩来的电报没有说明他见蒋的时间和次数,所以蒋的三点表示到底是在24日还是25日,我们还要看看其他史料的记载。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在12月25日这一天对周蒋会面一事作了较为详细记录:

“我与蒋夫人见了周,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

① 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157页。

② 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③ 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①

我们再看看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中的记载:12月25日上午:“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曰: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今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②

从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和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12月25日上午,周蒋实现了第二次会面,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谈话。当然,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日记》中完全是一副主宰者的语气,其言语虽与宋子文日记稍有不同,但其中含义基本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电报中的三点内容。虽然周恩来已于24日晚见到蒋介石,但因并无实质性谈话,所以他在25日晚向中央的汇报主要是当天与蒋介石会面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肯定西安事变时期周蒋会面有两次,一次在24日晚10时以后,一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由此证明傅斯年的两次会面和博古两次会面时间的说法是可信的。宋子文关于23日深夜周蒋第一次见面的记载并不存在,应是24日晚上的事;周恩来电报中记述的内容主要是25日第二次会面的结果,而不是申伯纯等人记述的24日晚上。同时说明周恩来与宋美龄的两次谈话应在24日和25日,王廷禹的宋周两次谈话“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的推断不能成立,而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的记述却是正确的。

三 周蒋会面时陪同人员的考证

西安事变期间周蒋会面时的陪同人员都有哪些人?只要我们弄清了周蒋会面的时间和次数,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

在申伯纯所著《西安事变纪实》、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和李义彬所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等书中,他们都认为:“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③这样,周蒋会面时似乎只有宋子文、宋美龄陪同,张学良并没有陪同,也没有在场。

但是,张学良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明确表示,周恩来见蒋是他领去的。1990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的记者对张学良进行了专访。在“12月24日午后10时,于高桂滋公馆,蒋介石与周恩来实现了历史性会谈”的问题中,日本记者问张学良当时在场不?张说:“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

①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② 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③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①后来,他对美国之音记者也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这样一来,我们对张学良的回答又作何解释?

因为大陆学者认为周蒋会面只有一次,或者说将两次会面混为一谈,所以就在陪同人员问题上造成了混乱。而海外学者虽认为会面有两次,但也没有搞清楚两次会面时的陪同人员。对两次会面时陪同人员的考辨,不仅可以说明他们当时的行踪,也可以甄别他们日后的记载。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在24日记载:“(张学良告诉蒋介石说)共党……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②

这里明确记载“必须张同其来见”和“妻带周来见”等,没有宋子文,可见24日晚上的会面,陪同人员为宋美龄、张学良两人,宋子文并不在场。宋子文在日记中说:“深夜,周(恩来)见了蒋夫人,并对委员长简短地说了几句。”宋子文没有提到自己,并且他还将在24日晚上的事误以为是23日深夜,进一步说明他并没有参与24日的会面。25日上午的第二次会面,宋子文有明确记录:“我和蒋夫人一同见周,他又一次要求见委员长。我是力促其成……周见到了委员长。”^③宋子文并详细记录了周蒋之间的谈话内容。可见这次会面,宋子文无疑与宋美龄都在场,但却没有张学良的身影。

再看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中的记载:12月25日,“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曰: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周乃作别而去。”^④蒋介石日记中也没有张学良在场的文字,只有宋子文与宋美龄。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张学良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就会发现,张学良仅仅是在24日晚上陪周见蒋。当晚周蒋并没有多谈,所以张学良说“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当日本记者在记述“12月25日晨,蒋介石同周恩来再度会谈”的过程时,就没有了张学良的语言,全是日本记者的叙述^⑤,这是因为张学良没有参与25日的会面,并不清楚当时会谈的情形之故。而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等著作所提到的“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也应该是25日上午的事。

经过上面的考证和辨析,笔者认为,在西安事变期间,周蒋之间曾两度会面,第一次是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此次会面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第二次会面在25日上午10时许,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这次会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谈话,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的表示,从而为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奠定了基础。从此国内战争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历史迈向了联合抗日的必由之路。

(作者张天社,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2页。

② 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③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④ 周天度、孙彩霞:《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⑤ 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8页。